

周恩来重庆统战记事

阚孔壁 著



1
00

重庆出版社

周恩来重庆统战记事

阚孔壁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五年·重庆

封面题字：许涤新

责任编辑：张德尚

封面设计：王仲莉

周恩来重庆统战记事

阙孔璧著

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渝计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字数：82千

1985年12月第一版 198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600

书号：11114·81 定价：0.58元

南方局的抗日统战工作

(代序)

许 涤 新

抗日战争期间，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坚决贯彻党中央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号召，战斗在陪都重庆，向国统区的人民宣传党提出的正确的政治主张和军事主张，在促成全民族的团结，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广大群众，鼓舞人民斗志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国民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成员，也是我们的统战对象。在抗战中，虽然国民党一些主要当权者没有放弃反共方针，但是，坚持抗战，诚心与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人士也不少。如冯玉祥、李济深、于佑任、孙科、邵力子、张治中、贺耀祖、王昆仑、朱蕴山、朱学范、李德全、倪斐君以及曹孟君等等。而张治中和贺耀祖还是当时的当权派。我们与这些人合作，反对国民党内的投降势力，促进团结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南方局领导，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对知识分子做了大量工作。郭沫若、邹韬奋、陶行知、马寅初、洪琛、翦伯赞、邓初民、侯外庐、沈志远等人都是周副主席和董老经常接触的朋友。

郭沫若在那时的文化界，成为吸引了千万个青年的旗帜！有一段时间周副主席每晚到民生路新华日报门市部二楼会见各方朋友。不仅谈团结抗战，而且谈历史、谈哲学、谈戏剧、谈经济等等。因人而谈，绝不千篇一律。这就把抗战救国的道理，同来访朋友的专业结合起来了。

统战工作有时还采取“做生日”、开纪念会的方式。对郭老创作25周年和50大寿、对洪琛的50大寿、对沈老的70大寿，等等，都利用这种形式，谈抗战、谈团结、谈民主。

纪念鲁迅逝世大会，记得周副主席在1938年处于危急时期的武汉，就出席过并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在重庆，周副主席也出席了几次纪念鲁迅的会议。有一次，他从文化上和政治上对鲁迅与郭老作了正确的评价。每一次纪念鲁迅都开成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提高士气的会议。

国民党指定同中共联系的张冲逝世后，在他的追悼会上，周副主席送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词。在追悼张的会上，副主席做了演讲，指出：“追悼淮南（张冲别号）先生，当继其志，加强团结，共御外侮”。这对于国民党中的一些人士，是发生了影响的。

不仅利用“红白喜事”，而且把戏剧作为武器，用以宣传抗日救亡。郭老在重庆时期的《棠棣之花》、《孔雀胆》等剧都收到很好效果。周副主席总是在上演之前，同郭老研究修改剧本；在上演之后，又组织南方局文委的有关干部写了剧评。每一篇剧评，周副主席总是动笔修改、补充。事实证明郭老的戏剧、周副主席的剧评，的确是团结抗日力量，推动抗日救国运动，打击投降势力的锐利武器。

周副主席多次同康心之、余名钰、吴晋航、卢作孚等民

族资本家谈话。1942年参观余名钰的渝鑫钢铁厂时，写了题词：“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钢铁厂的生产已为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

党的领导人同民族资本家集体座谈，我记得有两次。一次是在国民党湘桂溃败之后，由王若飞同志出面，在上清寺“特园”举行座谈，出席的有30多人。座谈会开得相当好。一次可能是在1944年冬，地点也在“特园”，由周恩来和王若飞两同志出面邀请，出席的人数更多，有刘鸿生、吴蕴初、胡子昂、胡厥文、李烛尘、章乃器、余名钰、吴羹梅、颜跃秋，以及陶桂林、胡西园等40多人。周副主席在会上突出爱国主义，强调抗战要坚持到底，民族要独立，国家要富强，工业家要为国家作出贡献。刘鸿生、李烛尘和章乃器诸人都发表了坦率的意见。座谈会开得有声有色。从此，我们就扩展了对民族资本家的统战工作。对地方势力，南方局也做了不少工作。周副主席亲自做了刘文辉、潘文华和邓锡侯的工作。

1942年周副主席向刘文辉分析国内政治形势，指出当时全国人民要求的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那年6月南方局就派王少春到雅安同刘建立了经常联系。并对潘文华做了一些团结工作。

湘桂溃败时，邓锡侯发生动摇，派人来找周副主席，周副主席给他分析形势，鼓励他坚持抗战。

周副主席在1943年9月派华岗到云南向龙云做工作。但在此以前，南方局同龙云、卢汉、禄国藩（云南宪兵司令）等人，已有联系。

南方局的统战工作的成功，要归功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亲身在虎穴战斗的周副主席，在贯彻党的统战工作上，却做了巨大的贡献，胡耀邦同志说：“毛泽东同志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为我们党制定了三大法宝，其中第一大法宝就是统一战线。而在实际斗争中，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几十年时间内，为建立、巩固和发展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作出最大的贡献的，则是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不愧是我们党建立以来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个模范。”在回顾南方局统战工作的成绩的时候，更加认识到胡耀邦同志这一估计的正确性。

目 录

南方局的抗日统战工作（代序）	许涤新（ 1 ）
第一章 又联合又斗争	（ 1 ）
原则性与灵活性	（ 2 ）
“沉冤莫白 后患胡底”	（ 4 ）
“同室操戈 相煎何急”	（ 8 ）
抓住要害 据理力争	（ 18 ）
第二章 争取同情和支持	（ 23 ）
不要勉强人家为难	（ 23 ）
“宏济艰难 为国效劳”	（ 28 ）
生死不苟 大义凛然	（ 31 ）
“安危与共 风雨同舟”	（ 32 ）
安危旋转赖通儒	（ 35 ）
站在团结抗日旗帜下	（ 37 ）
走上联合的道路	（ 39 ）
回到了人民怀抱	（ 42 ）
“不能再增添更多麻烦”	（ 44 ）
第三章 但愿朋友遍天下	（ 48 ）
不要冷落小党派	（ 48 ）
把爱国资本家团结起来	（ 51 ）
为民族工业打下基础	（ 55 ）
我们能够继续合作	（ 57 ）
“上马杀贼 下马学佛”	（ 58 ）
第四章 知识分子的知心人	（ 61 ）

	一场重大的斗争·····	(61)
	山城的空前轰动·····	(64)
	尽瘁于民主事业的战士·····	(67)
	“毕生最佩服的朋友”·····	(70)
	坐帐无鹤 支床有龟·····	(74)
	为大家的安全操心·····	(77)
第五章	广泛发动群众·····	(81)
	充分利用纪念节日·····	(81)
	推动抗战 扩大影响·····	(85)
	重视舆论的作用·····	(86)
	语重心长的教诲·····	(90)
	敌所欲者我不为·····	(93)
	“不能放弃这种机会”·····	(95)
第六章	不同形式的统战组织·····	(97)
	一个不公开的团体·····	(97)
	科学工作者之家·····	(99)
	文艺家们的战斗队·····	(102)
	勤学勤业勤交友·····	(105)
第七章	做好国际友人的工作·····	(108)
	革命事业的需要·····	(108)
	两大民族友爱的象征·····	(109)
	促成美国态度的转变·····	(112)
第八章	注重理论研究·····	(114)
	科学地分析形势·····	(114)
	不是天然的司令官·····	(117)
后 记	·····	(120)

第一章 又联合又斗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它形成的那天起，就不是铁板一块。尽管在日寇的疯狂进攻面前，国共两党为了共同的民族利益，携手合作，共御外侮。但两党之间长期战争所造成的互相仇恨和互不信任的心理，不可能就这样得到消除，因此，这种合作是不很牢固的。尤其是蒋介石，他在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交往中，深知共产党是一个其纲领和政策深得民众赞同而又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具有极大影响的政党，它的存在对自己的统治地位确是最大的威胁。因此，过去总是想方设法妄图将共产党一举剿灭。但是，事与愿违，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在蒋介石的疯狂围剿下，虽然几遭挫折，甚至濒于危境，但都化险为夷，绝路逢生，并且以更加顽强的意志和更为迅猛的势头发展壮大，这不能不使蒋介石在极度的仇视中感到惊惶。日寇的大举入侵，不仅使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也使蒋政权处于风雨飘摇的愁苦境地。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已经无力剿灭共产党了，只好把对共产党的仇视和惊惶暂埋心底，以待将来。可是，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计前嫌，不究既往，主动提出

与国民党联合抗日，并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又使蒋介石措手不及，只好被迫同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这对他来说，当然是不得已的，是极不情愿的。因此，从合作的第一天开始，他就无时无刻不企图限制、削弱乃至消灭共产党。对这一点，中国共产党是有极为清醒和深刻的认识的。这样，如何在共同抗日的旗帜下，抵制、挫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的企图，同时又尽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始终遵循的原则。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身在统战工作第一线的周恩来同志，以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掌握高超的斗争艺术，应用灵活的斗争方法，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原则性与灵活性

1938年12月。此时，国共两党在抗日的旗帜下，已经团结合作了一年多，并取得了许多令人振奋的战绩，但蒋介石想限制和消灭我党的心总是不死。他在是月12日邀见我党代表周恩来等人时，提出了国共两党实行“合作”的几种办法，即：一、国共两党都解散，另外组织新党；二、共产党解散，加入国民党；三、保持两党协商现状，看一看再说。名曰三种，实为一条，就是企图以合并的手段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其他的都是空话。周恩来等看透了这一阴谋，以坚定的原则立场，当即明确地予以拒绝。

到了翌年的1月20日，周恩来又特地会见蒋介石，再次表示：蒋前次提出的关于国共两党合并成为一个大党的办法是不行的。次日，他在给党中央的情况汇报中，特别建议以中央的名义回复蒋介石，严正拒绝蒋妄想并吞我党的要求。

当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同意他的建议，并告知已发给蒋介石的电报全文时，他立即写信给蒋介石，并将我党中央给蒋的电报抄好送去，

周恩来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就通过口头和书面等多种方式，先后三次严词拒绝蒋介石妄图消灭我党的要求，充分表现了他捍卫党和人民利益的高度原则性。在原则问题上，一点也不含糊，一点也不让步。

1939年3月，国民政府公布了一个《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到了5月1日，又宣布从即日起，在全国各地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厉行“国民公约”，举行“国民月会”。它一方面提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三大目标，表明了它抗日的进步性；另一方面又大肆宣扬“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政府”的法西斯信条，又暴露了它反共的反动性。

对于国民党这个具有两面性的纲领，周恩来既不一概地肯定，也不一概地否定，而是采取科学的态度，即赞成其进步的前者，反对其反动的后者。在行动上，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于6月5日正式致函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秘书处，表示愿意加入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设计委员会的讲演组。之后，他就广泛地开展讲演活动。无论在一年一度的“七·七”和“九·一八”等周年集会上，还是在各种群众大会上，以及应邀出席的会议上，周恩来都勇于讲演，并在讲演中充分利

用精神总动员这一形式，根据其中一切积极的东西，去具体分析每一时期的国内外政治形势，阐明抗日战争的前途、争取抗战胜利的办法，批驳不利于团结抗战的各种谬论，解释我党坚持抗战的路线和政策，借以武装群众，争取朋友，打击敌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沉冤莫白 后患胡底”

围绕“平江惨案”问题，我党与国民党进行了自抗战以来的第一次严重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周恩来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与其他方面紧密配合，取得了重大的成功。

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顽固派根据蒋介石的密令，指挥第二十七集团军包围并袭击了设在湖南平江的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杀害了新四军参谋涂正坤和通讯处军需员吴贺立，还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活埋，从而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平江惨案”。在此前后，“博山惨案”、“深县惨案”、“确山惨案”等一系列事件相继发生，连同它的军事进攻一起，构成了空前规模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使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日局面，笼罩上浓重的阴影。

国民党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刻大肆反共呢？这不是偶然的。自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的侵华策略有了大的改变，即将对国民党以军事打击为主改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同时，英美的劝降活动也日益加紧，再加上对人民革命力量迅速发展的恐惧和仇视，使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在政策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即从抗战初期比较积极抗日的态

度，变为单纯防御、伺机反共的立场。这种变化突出地表现在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上。它根据蒋介石《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决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并设立了“防共委员会”。会后又陆续秘密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文件，规定要取消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抗日军政组织，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加以限制、打击和消灭。“平江惨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面对着国民党顽固派气势汹汹的进攻，周恩来沉着冷静，大智大勇，运用灵活的策略，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

最有效的回击是事实。周恩来在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的电文中，用确凿无误的客观材料，叙述了国民党制造这一惨剧的经过，借以明辨是非。他特别指出，制造惨案的目的并不止于反共，还在破坏抗日战争的进行，走上对日妥协投降的道路。击中了问题的要害。

为了掩盖自己的罪恶，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反扑。先是军令部长徐永昌打头阵。他在14日给周恩来等人的电报中，不仅不承认错误，反而诬蔑新四军平江留守处涂正坤等人的抗日行动，是什么“纠集土匪，扰乱后方”，而对无辜杀害浴血奋战的战士，则美其名曰“维持后方治安”的“适当处置”。他们犹嫌这种弥天大谎不够，又在其军政部长何应钦21日致周恩来等人的电文里，再一次为自己开脱罪责，颠倒是非，胡说“平江惨案”的发生，是因为新四军在该地的留守处私藏国民党部队的逃兵，国民党军前去搜查时，留守处人员却加以拒绝，这样才引起对新四军人员的杀害的。

对于抵赖和反诬的最好办法是据理驳斥。22日，周恩来等我方领导人在给徐永昌和军委会以及其他各部的电报中，严正地批驳了国民党军方歪曲报道惨案经过，和国民党当局对我平江留守处的造谣中伤。指出：我该留守处早在抗战初起的1937年9月就宣告成立，涂正坤、罗梓铭在那里工作已近两年。他们勤勤恳恳地为抗日事业献身，支援前方作战，维护当地治安，决非土匪可言，至于什么藏匿国民党逃兵之说，全是无稽的论调，更不存在所谓拒绝搜查的事情。明明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杀害的，反而诬为“土匪”，而杀害抗日战士的人居然无罪，难道在古今中外还有如此的奇冤么！国共团结是战胜日寇的基本条件，在这国家危亡的时刻，国人只有同心合力，方可挽狂澜于既倒。不幸抗战阵营中，顽固分子以排斥异党为能事，到处制造摩擦，汉奸亲日派乘罅抵隙，大肆挑拨离间，以破坏两党关系，使两党自相鱼肉，抗战力量损耗，日寇则乘机收渔人之利。进而警告说：“今当局任意加爱国者以土匪之名，沉冤莫白，令实际助日寇者，免国法之讨，怙恶难悛，此风一开，后患胡底。”并强烈要求进行实地调查，以查明真相，雪冤治罪。当局为了敷衍社会舆论，叫了个以反共昭著于世的薛岳负责调查此事，而薛的“调查报告”依旧认为犯法者有功，无辜者有罪。对此，周恩来等极为愤慨，于7月28日再次电告何应钦，痛加批驳，同时要求另派公正大员前往调查，将肇事的人员交军法审判，并采取措施，保障被害人家属及同事有陈述和质证的自由。

为了同我党中央领导人商讨由“平江惨案”而引起的局势变化，解决双方军队摩擦的策略，周恩来随即返回延安。

在延期间，他和我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继续进行斗争。在是月的31日，他向《新中华报》记者详谈了“平江惨案”的经过真相，再次重申了我党的严正立场；在8月1日延安人民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的集会上，又由毛泽东发表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讲演，指出，我抗日战士的被害，是“中国的反动派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准备投降”的前奏，“这样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国就会在这些反动派手里灭亡”，因而“我们必须要求国民政府严办那些反动派”。同时号召抗日的广大群众，提高革命警惕，加强抗日队伍的团结。

我党在政治上坚持揭露的同时，在军事上又进行了坚决的自卫。在陕甘宁边区，我八路军胜利打退了胡宗南的进攻，乘胜解放了绥德一带50万人民，并使陕甘宁与晋绥两个边区连成一片。在山西，抗日决死队在八路军的支援下，给阎锡山军以重大打击后，转移到晋西北和太岳区，壮大了八路军的队伍。在太行山区和河北南部，痛歼了朱怀冰、石友三等国民党军三个师。蒋介石最怕的就是力量，我们把他的力量消灭了，他就没有说的。当朱怀冰部被我军消灭光之后，他只好捏着鼻子叫卫立煌和朱德总司令谈判，划漳河为界。

蒋介石以制造“平江惨案”为起点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最后以被消灭三个师而结束。蒋介石被迫坐下来同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谈判，使国共两党继续合作的局面得以维护，神圣的抗日战争绕过暗礁，又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了。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平江惨案”后刚刚半年，一场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又在长江南岸发生了。这是一个有预谋、有计划的重大政治阴谋，较之“平江惨案”，更为严重，因而国共两党围绕这一事件所进行的斗争，也就格外尖锐、激烈。站在这场斗争最前列的周恩来，所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更是使顽固派丧胆，令广大群众钦佩。

千古奇冤

蒋介石集团在华北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遭到失败以后，并不肯善罢甘休。他们眼见华中我军势单力薄，便把反共中心转向华中地区，企图一举歼灭和驱逐新四军。因此，自1940年春季以来，长江北岸的反共风云日渐紧张，摩擦事件纷至沓来。但都遭到我军的有力回击，尤其在是年9月下旬至10月上旬的苏中黄桥战斗中，陈毅等指挥我军，经过三天激战，一举歼灭国民党军一万一千多人，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仅率千余残部溃逃，苏、鲁地区根据地遂联成一片，形成华中根据地的新局面。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又被迫把反共的重心移往江南。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即指使其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诬蔑我新四军破坏团结与抗战，强令我军在一个半月内全部撤至黄河以北，企图在江南新四军向北移动中加以歼灭。时至11月10日，蒋介石密令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